

靠纳税人贴补的国企凭什么奢华无度

美国媒体2月3日报道,奥巴马已决定,对接受联邦政府大笔金融救助款的企业高管设立50万美元年薪上限。除这50万美元和应得股息之外,不得再有奖金等补偿。在接受救市款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分别是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美国国际集团、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这5大企业都面临严重问题,它们的高管年收入也都远超50万美元。(《新京报》2月5日)

[中国青年报一评]

对于下限薪的原因,奥巴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接受纳税人的帮助,你就有责任不过奢华生活。”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尽管美国的一位薪酬顾问称,这一限薪规定相当严厉,可能留不住高水平管理人才,但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当金融危机已危及企业生存,这些大企业必须依赖纳税人的钱方能渡过难关时,限薪令的发布无疑来得正是时候。

由奥巴马的限薪令,我不由得想到近期也接受过国家财政补贴的国内一些大型企业:《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1月27日报道,国资委表示,将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支出196.3亿元,用于支持在特大自然灾害中损失较重的中央企业灾后恢复重建,其中包括电力公司。据悉电企获得的补贴应该在100亿元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东航与中国南航将分别获得30亿元的政府注资,而国航则获得100亿元的政府注资。而且,因受金融危机波及,国内其他一些领域的大型国企,也极有可能获得国家财政的扶持。

无论是国内五大电企集团,还是获得注资的三大航空公司,其企业高管与普通工作人员的年薪,都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获得财政补贴后,虽有电企高管表示将降薪,但此后便不了了之,似乎更像是一场秀。

两相对比,同样是受国家财政扶助,美国包括花旗在内的五大企业就必须接受奥巴马的限薪令。国内接受财政支持的国企数量更多,但除了少数几家主动做降薪姿态外,其余各家均默不作声。显然,当此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仅期望靠企业高管的道德自律来降薪,并不现实。所以,我们也有必要颁布

↓国企“限薪令”该学学奥巴马

一个限薪令,对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渡过难关的国企予以制度上的约束。

所有的国企都不能一方面在危机中享受着国家财政的高额补贴,一方面却又给自己的员工,尤其是高管继续发放高得离谱的薪酬。倘若国内一直难有限薪令出台,无异于拿着纳税人的钱为这些国企高薪酬埋单,这是所有纳税人不能容忍的。特殊经济时期的国家财政补贴,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救命钱,对那些获助的大型国企,有关部门理应拿出一个限薪政策来。

[快报再评]

对于这次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有人谴责说是因为高管们贪婪无耻,有人挖根说是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监管责任。其实,两者是紧密相连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永远存在,政府的适度监管才能兴其利而防其弊。中外概

中国青年报 2月6日 作者 罗晋

莫能外。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的国企高管不是人才市场竞争出来的,而与党政干部一样是组织部门选拔任命的,很多还是“相当”什么什么级可平行调职的官员,他们凭什么享受超高薪?地方的党委书记与国企的党委书记都是党的干部,合法薪酬为啥相差那么大?

世行副行长、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说,人民币升值也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根子在金融机构“劫贫济富”、资源暴利、垄断暴利。林所指出的三大问题都与对国企超国民待遇的特别扶持有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企作为“特保儿”,其高管不是凭真本事做出了什么大贡献,岂能心安理得享受超高薪酬。至少,在经营业绩并不辉煌的时期,应该像美国人一样把他们的薪酬限制在普通员工10倍之内。

院士不知羞耻 让国人蒙羞

↓利益面前学术良心如此卑微 中国青年报 2月4日 作者 杨涛

祝国光博士惊讶地发现,那些看起来水平非同寻常的学术论文大都是编造的,而且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及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和课题组主要成员。(《21世纪经济报道》2月3日)

[中国青年报一评]

老实说,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已经对我形成了“审美疲劳”。但浙大博士后贺海波的论文造假还是引起了我的震惊。

让我们看看有关方面的表演吧!祝国光受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委派回国打假,并先后向卫生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中医科学院、浙江大学等机构发出具名举报信,但祝表示,迄今为止,只有中国工程院表示收到举报,正在立案调查;浙江大学方面两次打电话给祝国光,称“造假行为系贺海波个人所为,与李连达院士无关”。

出现学术造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及所谓“声誉”,高校、研究所等学术单位甚至是主管学术单位的行政管理部门“讳疾忌医”,一味地护短,学术界缺乏自我净化、自我纠错能力。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在诸多学术造假被揭露后,有关方面大多持如此态度。

难道,对于国内那些以学术为生命的大学、研究所,在利益面前,追求真理的信念、学术事业的发展、学术纪律的维护、学术良心的捍卫,都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微不足道吗?可以说,正是学术自我纠错机制的缺失,学术界缺乏自我净化的能力,学术界造假被揭露的几率很小,即使被揭露,所接受惩罚也很小。在利益大而成本小的驱动下,所以,我们不仅出现学术造假,而且出现大面积的学术造假;不仅学术造假在各个领域风行,而且学术造假前仆后继,在造假者跌倒的地方不断前进。

[快报再评]

此事是学术界的三聚氰胺事件,对中国学术界的信誉伤害极大。相关国际刊物编者已明确表态,今后对来自中国的论文要更加慎重(“提防和排斥”的委婉表达)。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中国学术界应该对造假者集体表达愤慨,应该群起而攻之,以防类似事情再发生。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据“浙江在线”后续报道,事涉这次学术造假、剽窃论文事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竟然有脸指责“祝国光此次不遗余力地打假,根本原因出在自己一项即将公布的研究成果威胁到了祝国光所服务公司的商业利益,该研究结果表明这家公司生产的用于冠心病治疗的某药物的实际疗效与宣传效果不符,于是该公司试图收买李连达不成,便出现了祝国光的举报事件”。祝国光动机如何与他揭露的结果有什么关系?你该回答的是祝揭露的内容是否成立!有这样不知羞耻的院士是国人之羞,先撤了他再说吧。

别剥夺农民工对四万亿的知情权

在谈到农民工该早点返城找工还是晚点时,嘉宾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还是晚点出来比较好,因为我们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的落实是有个过程的,一旦实施后需要大量人力。大意是农民工不必过完年马上赶到城市找工,与其早早返城找不到活干耗着,不如在家等四万亿工程。(央视《新闻会客厅》2月3日)

[燕赵都市报一评]

今年找工不容易,现在连农民工兄弟在记者面前都会侃侃而谈金融危机。他们心里很清楚,等待他们的是僧多粥少的局面,他们应对的办法就是早出门、早找工。可现在专家又说了:别急,早起的鸟儿不一定有虫吃,不如晚起等着四万亿。

想当初四万亿闹腾出多大的动静啊,全国各地的地方发改委赴京争分蛋糕,难道不值得大家等待吗?

可是,现在四万亿在哪里呢?自去年11月5日各地向发改委递交审批申请以来,哪些项目被批准了,哪些项目开工了,媒体上不见一字半言。空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请问:四万亿到哪了啊?

别说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的农民工不知道,连上海

↓农民工对着大山喊:四万亿你在哪里 燕赵都市报 2月6日 作者 范大中

律师严义明都不甚了了,他也正好奇着呢,于是向国家发改委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四万亿投资的审批项目详情。可是很多资深专家都说,严义明的要求可能得不到答复,谁有空儿理他啊。

不关心时事的农民工不知道,好奇杀死猫的严义明不知道,郑副院长您知道么?知道就告诉农民工兄弟吧,四万亿投资投到哪了,叫什么工程,在哪发布用工信息,准备雇佣多少农民工。或者,预计何时开工,预计留出多少职位?

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却找不到活干,这的确是个问题。正如嘉宾专家所说的,等到弹尽粮绝,就可能会出现类似去偷去抢的社会治安问题(这里面显然有阶层歧视的成分)。这种情况

下,建议农民工不要轻易返城而是呆在家等四万亿是个好主意。

可你以为农民工不想这样啊,他们也跟那些挤暴发改委的人一样,望眼欲穿地打着四万亿的主意,还不是因信息不畅而失去坐等的信心才争先恐后返城找工的呀?

农民工漫山遍野地喊:四万亿啊,你在哪里?谁知道就请告诉他们吧!

[快报再评]

4万亿在哪里?温家宝总理最近访欧时说,肯定没有拿去给银行堵窟窿。4万亿的投资也肯定不是画饼,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就达6万亿,外汇储备之多更是举世瞩目——好多国家还等着要中国“救”他们的经济,即采购他们的商品呢!这不,温总理访欧过法国而不入,法国总

理急了,近日表态“需要中国”的合作。问题只在于4万亿的蛋糕怎么分,有时候财富的分配比创造更艰难——不闻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吗?

所以,我劝严义明律师要有耐心,等着有关部门把4万亿的蛋糕切好了再告诉你。不对呀,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难道只能表现在了解既成事实吗?为什么不能参与讨论并监督切分蛋糕的过程呢?

更重要的,我觉得,让地方政府,让上亿的农民眼巴巴地盯着政府投资,这不是提振经济的治本之方。我们不是一再说要改变经济结构吗?这种所谓改变,无非发展服务业,无非发展民营经济,这种改变靠的是制度更新和政策激励而决不是简单地撒钱下注。

晒财产之前先晒晒公共开支

浙江慈溪市开始推行干部廉政情况公示制度,该市大部分副局级和局级官员的家庭财产、亲属从业等情况,将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官员工资收入多少,有几处房产,有没有私家车,如果有是什么牌子、型号,家住哪里,爱人在哪里工作,孩子在哪里上学等等,统统都要写在纸上,贴到墙上。(央视《东方时空》2月5日)

[长江商报一评]

慈溪市推行的官员廉情公示制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慈溪市实行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如单位内部)“公示”,阿勒泰地区实行的是向社会“公开”。从公开的范围上看,慈溪无疑要略逊于阿勒泰。

不过,就公开内容而言,慈溪要比阿勒泰领先一步。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公开主要包括“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劳务所得”和“申报人及亲属接受礼金、贵重礼品等”四项,不像慈溪公示那样包括房产、汽车等大宗财产以及官员亲属从业、子女就学等情况。综合看,慈

溪、阿勒泰两地的官员财产公开“各有长短”,都探索出了积极的经验,也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浙江慈溪市和新疆阿勒泰地区,一个是东部沿海的富庶之地,一个是中国版图西北角的边陲小城,这两个地方在官员财产公开方面不约而同迈出第一步,绝非偶然。

阿勒泰地区进行财产申报公开时,有质疑之声认为,阿勒泰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官员的合法收入普遍不高,获取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的机会不多,换了其他地方就很难说了。浙江慈溪干部廉情公示制度的推行表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不但可以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实行,也可以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被很

↓还有哪些地方的官员财产不宜公开 长江商报 2月6日 作者 潘洪其

多国家证实为政治文明的有益经验,也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反腐倡廉和民主法治建设,这些道理无需赘言。需要探讨的是,它在当下中国具有多大的可行性?会不会遇到天大的阻力和困难?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用他们各自的实践证明,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和困难不是没有,但只要真正有决心、有诚意推动这项改革,就一定能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既然不发达者如阿勒泰、发达者如慈溪都能推行官员财产公开,那么,还有哪些地方的官员财产不宜公开呢?那些言必称“条件不成熟”、“阻力和困难很大”的地方,也许是在为拖延改革甚至反对改革寻找借口吧。

官员财产公开,是先进国家的惯例,行之有效,行之有素,其益处不用多讲。

不过,说实在的,官员家庭财产公开,不仅牵涉到官员的父母子女,还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有关,比如人家原先是经商的或者是可以炒股的普通干部,财产来源多嘛。最容易做到的是从公共开支的源头公开做起,即从公共预算和支出的公开做起,既往不咎地从现在做起。我认为公共开支的公开做好了,官员腐败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甚至买官卖官的交易也会少很多。为什么不先易后难做好做实这一点呢,如果真想防腐反腐的话。